

# 近代史研究

1

1980

1163114 K250.7  
1980/2/21

一九八〇年 第一期

目 录 (总第3期)

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 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肖 克 (1)
- 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赵 鎔 (39)
- 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贾熟村 (99)
-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王来棟 (131)
- 救国会史略……………周天度 (161)
-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林金枝 (199)
- 夏正寅《袁牢夷雄列传》辨伪……………邵献书 (231)
-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在中国……………夏良才 (248)
- 读《谭绍光封王时间考》……………叶桂生 (263)
- 史札记《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杨天石 (268)
- 记《一九一二年六月陈其美寄电考异》……………朱宗震 (269)
- 一九七八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书目(二)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71)

A 609896



# 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

肖克

本文是我的一次谈话记录，说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前身——会师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支部队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军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革命的洪流，奔腾万里，冲破了旧社会的层层屏障，出现了新的天地。这段历史，现在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当年那种波声涛影，好象都在眼前。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作一回顾，献给二方面军已故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和当年为革命而捐躯的二、六军团的烈士们，并用以激励自己，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 一、六军团北上、西征及与二军团会师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军委派蔡会文和我到了湘赣苏区的红八军工作。红八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离开湘赣边区后，由各县留下的地方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发展起来的。红军第二次打长沙时期，湘东南特委集中部分地方武装，成立了湘东独立师。后又将湘鄂赣边部分游击队编入，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不久，湘赣临时省委又将其改为独立第一师，同时把独立七团和湘南游击队组成独立第三师，一九三二年二月，湘赣省委根据中央军

委的指示，将独立一、三两师编为红八军，以独立一师师长李天柱、政委王震同志兼代军长政委。红八军的领导机关是由独立一师兼任。蔡会文同志和我到湘赣苏区后，正式组成了红八军军部，辖三个师，原独立一师改为二十二师、新独立师改为二十三师、原独立三师改为二十四师。我为军长，蔡会文同志是军区总指挥兼八军政委，袁任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六月间在永新，我们按军委命令，将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震同志为主任），下属49、50、51三个团。但这时，红六军团没有设立领导机关，也没有使用过红六军团的番号。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我中央苏区。我们湘赣根据地在本次反“围剿”中，是中央根据地的侧翼，是辅助作战方向。十一月，位于东路的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策动下，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秘密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打乱了蒋介石从四面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迫使蒋介石由北线抽出七至十个师的兵力开往福建，企图压垮十九路军后，转而再进攻我中央苏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当蒋介石主力围攻延平、古田十九路军的时候，中央军委电示湘赣省委及十七师，要十七师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会合正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南浔路，位于蒋介石北路军侧后，是由南昌至九江的交通大动脉。十六、十七师北上破坏南浔路，目的在于箝制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以及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中央红军也是要配合十九路军，但由于“左”倾路线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没有积极有力的行动），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利于中央红军的

反“围剿”。

我十七师于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北上。这天的拂晓，在分宜县以东的肖公渡，我们一举突破了敌人沿河设置的防线，涉渡了袁水。我军渡袁水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恐，急令朱耀华等部进行堵截。当我部进至宜丰、修水间的黄沙地区时，敌朱耀华也率其十八师及六十二师各一旅赶到了黄沙，拦阻我军。我当即发起攻击，经六小时激战，突破了敌人一八四旅阵地，敌仓惶溃退。这次战斗，敌五、六架飞机三次由南昌飞来临空助战，使我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伤亡不小。当战斗正在紧张时，我巧妙地利用缴来的敌陆空联络信号，诱使敌机对开始溃退之敌狂轰滥炸，我全线乘胜攻击，敌全部溃退到潭山市。这一胜利，打出了威风，冲开了前进的道路。在黄沙战斗结束的当夜，我们与红十六师会合了。

我们乘胜继续向南浔路迂迴前进。当蒋介石发觉我们的意图后，妄图利用我们远离根据地的机会，要把我们消灭在修水、富水之间。他急令三个三团制的独立旅沿瑞昌、岷山、德安、永修铁路线加强戒备，防我破路；令两个旅沿修水南岸布防，堵我南下；又令八个旅跟踪，寻我决战。我十七师在红十六师的掩护下，于十七日黄昏抵达中央军委指定的德安县的马迴岭车站附近，准备破路。但发现敌速增调重兵，守备严密，我军地形不熟，加之雨夜泥泞昏暗，缺乏破路经验和工具，破路未果，随即撤至德安县的九渡源和上、下陶庄一带山区，准备寻机再去破路。这时，敌八个旅的追兵都围了上来，我们与敌激战于陶庄，因敌众我寡，又和红十六师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不利，就决定迅速摆脱敌人，于二十日乘雨夜从间道突围，秘密向南转移，第二天急行百里，在永修柘林市附近巧渡修水。国民党一个军官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伪十七师（指我们）仅有枪支千余支，窜入袁、锦、修水等地区，任其纵横驰骋，到处骚扰，国军以五师兵力，分任堵击无效，结果使该匪毫无损失，安然南窜。不知任追击之部队，将何以卸其责？”过修水后，除朱耀华部外，敌又增加了六个团的追兵，想阻止我们返回湘赣根据地。二十六日我们转移到修水县的石溪，作了暂短休整。三月

一日，敌两路追兵已到，我们甩开敌人继续向西转移，于二日晚，在修水县的来苏，击破敌人的防堵，又于漫江击溃敌五十师一个旅的袭击，胜利地通过了武宁、修水、铜鼓封锁线，五日到达幽居革命根据地，找到了湘鄂赣省委。蒋介石鉴于消灭我军的计划一再落空，气急败坏地训斥敌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督剿”不力，敌师长朱耀华、彭位仁、岳森、郭汝栋等，一律降级记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十七师这次行动意义和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了。但是，最后因湘鄂赣边根据地分割二十多块，粮食极为困难，敌人太多，干部伤亡很大，（我和李达同志也在这次挂了花），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决定回湘赣苏区。大家不顾疲劳，奋勇前进，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末，从宣风、泸溪之间，强渡袁水，回到了湘赣苏区。这个回师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

我十七师在这次近两个月的行动中，敌人共动员四十六个正规军的团，还有许多地主武装，堵截追击包围我们。我们这个小游击兵团，击溃朱耀华、岳森、陶广等部六个团，破坏了敌人数百座碉堡，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装，捣毁国民党区公所、食盐公卖处等数十所；通过了二千五百里白区，五百里赤区，渡过了好些江河，越过了崇山峻岭，冲破了敌人五次大的包围，打退敌人五次大堵击。军行所至，宣传群众，打土豪，给群众分东西，给地方武装发枪。打仗时瓦解敌军，争取俘虏等等。十七师的声威，真有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的布告上讲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那种气概。

对这次十七师北上行动怎么看？我认为，中央军委要十七师北上的决定是不实际的。这是因为，“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攻势转为守势，并由北路军调部分兵力去福建进攻十九路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红军应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样就能够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并能援助福建政府，起一箭双雕的作用。如果这样，那么十七师的北上也就是对的了。而王明路线没有这

样做，却把红军主力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地带，指令十七师在十九路军将要失败时北上，会合红十六师，出南浔路箝制敌人。十七师这样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使自己暴露于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域，不仅不能完成破坏南浔路和威逼南昌的任务，反而因与十八师分兵，使根据地中心区受到损失，而且也使十七师本身受到削弱，但是，十七师北上的行动是积极的，起到了箝制、调动敌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同时锻炼了部队，为回师湘赣，保卫苏区树立了更大的信心。我们在与十倍以上之敌的作战中，采取了主动的运动战、游击战，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并在敌人大包围中，善于摆脱优势的敌人。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广大指战员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十七师北上以后，敌人乘机进攻我湘赣苏区，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被敌占领了。我十七师回师湘赣苏区，同留在那里的十八师会合（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及五十三两个团）。这时，敌人调集重兵，妄图乘我十七师长途行军的疲劳和严重减员，进行大举围攻。我们在任弼时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在地方武装和苏区人民配合下，两个师协同作战，连续打了两个胜仗。一次是四月上旬，在永新附近的沙市，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敌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一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楨及旅参谋长赵楚卿，这是河西（赣江以西）战场上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另一次是四月中旬，在安福、莲花间之利田，打垮了敌六十二师的王喻琰的一个旅。这样，湘赣苏区的局势就开始稳定下来了。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干扰，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五、六两个月部队消耗很多，加之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又占领苏区中心的永新城、钱市街等地，分割苏区，我军的机动范围更狭小了。六月底七月初，主力不得不退出苏区的中心地区，撤到永新南面的遂、万、泰三县之交，也就是井冈山的东南面——牛田碧江洲一带。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

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一九三一年三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陂、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



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方向和箝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地准备，我军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全军九千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很难走。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打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运动战原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当着中央红军沿着我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

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至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无数类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四个保安团堵防拦击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八月十二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二十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一天，二十三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敌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地进行了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的战斗，破坏了尾追我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八个多团，于九月四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九月八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

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箝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当日我们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岗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在小水遭敌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迴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反动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到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贵州除了群众不了解我们和山路难走外，地形也不熟。那时我们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从湘西到贵州，作战也非常困难。这时候笨重行李虽然丢得差不多了，但强敌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通道以西四十里之新厂，杀了个回马枪，把何键的补充第一纵队何平部两个团全部击溃，缴获甚多。从此，敌人就不敢轻易尾追我们了。我们继续向西，过通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

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十八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黄平县城，继续向石阡前进。

但是，我们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我军被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四个团的包围之中，形势对我非常不利。为了摆脱这种严重被动局面，十七师的49、51两团之一部，由49团特派员谭善和、51团樊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继续前进，首先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三军的一部会合了。而十七师的50团与49团之一部和十八师、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半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都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我们。我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暗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从此，六军团战胜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了。

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两军团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这时，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同志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同志改为二军团副政委。原红三军的七师改为第四师，辖第10团和12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辖第16团和18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49、51、53三个团。中央还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一二、六两军团的指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以贺、任、关为首的核心领导已经形成。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决解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 二、战斗在湘鄂川黔边

会师后，我们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师的时候，二军团有四千多人，六军团有三千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八千子弟。虽然子弹不多，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同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周小康、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

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肃反扩大化,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据地。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二百里,人口只十万以上,人少粮缺,这对二、六军团会师之后作更大发展的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怎样找到更好的发展前程呢?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這些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贵州军阀赶出来的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钧等部的四千多人,他们都是寄食于陈渠珍,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军阀陈渠珍,他害怕我军返回湘西,赶忙派出龚仁傑、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先经湖北省西南角咸丰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开敌人,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整个情况。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

队，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省军阀徐源泉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醴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子弟，但均为严酷战争铸冶的觉悟战士，加之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同时还可得到群众支援，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消灭这股敌人。只有消灭了这股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这就更坚定了我们歼灭陈渠珍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为迷惑敌，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过永顺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虑其先头退而固守，我故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为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装入大量敌军。谷地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于是，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贺、任、关率二军团部和四师布署在毛坝附近，把十七师（两个团）放在杉木村东山，把十八师（一个团）放在北山。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敌前军龚仁傑、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傑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傑、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十多里，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五里地左右的把总河筑构工事，企图顽抗。我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第十八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入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

枪二千支，打垮了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的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空虚，敌人战斗力不强，弱的好吃。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地形选得好，我们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两个军团团结一致，沉着勇猛，动作迅速。当夜间攻击杨其昌的时候，十八团和五十一团并肩攻击，都打得好，发扬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也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后，我们留下一些部队，在那里做地方工作，开始建立省级机构，展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进攻大庸，歼灭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了大庸城。稍加休整，主力向南打沅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东，在桃源、沅溪河一带给罗启疆的独立第34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占领桃源，迫近常德。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打开这个局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把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旅打垮了，逼近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鼓舞了革命群众。第二、部分的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我们，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急令在湘南拦截红军的敌十九师、六十二师和十六师兼程北进。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也改变了蒋介石要他去四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行动，调了三个主力师分别布署在鄂西施南一带和湘西的津澧地区。蒋介石也速令在江西的二十六师增援常德，并以四个师的兵力转到湘黔边境。当时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转入贵州，国民党第62师、16师追至通道西四十里之新厂，因我们打到桃



源,这两个师就改向北调,向我进攻,这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有力的策应。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为什么能够胜利?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什么能很快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全体指战员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决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们虽然是两个根据地临时会合起来的军队,但都有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二军团离开了洪湖,离开了湘鄂西,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深感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了湘赣苏区,长途行军,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也有同样的感受。还应看到,六军团长途奔驰两个多月,进到地形、民情、风俗与江西不同的贵州、湘西,就对和这一带人民有联系的红二军团,带着依存心情;二军团过了两年的流动生活,对于带来了朱、毛红军光荣传统的六军团,思想上也有向往之情。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而战斗。八千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马到成功。

第二、正确地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所以,两军会师后,战略上指向湘西。因为湘西只有陈渠珍的土著部队,是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我党在那里又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利于我们发展。在湘西攻势中,我们的作战方法也有很大改变。从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战略转移中有很大的削弱,使我们体验到(虽然当时是不大自觉的),只能和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再不能采取退出湘赣苏区前两个月那样,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所以在战役战术布署上,采取诱敌人彀,急而歼之的方针。这种打法,过去是用于敌人进攻根据地条件下的。我们新到湘西,敌人很快就来进攻,我们还来不及把根据地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诱敌人彀,急而歼之的战法比较有利。这是属于诱敌深入范畴的,只是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罢